

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概況

An Over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

Zbigniew Wesołowski SVD（魏思齊）*

一、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脈絡

16、17 世紀不列顛（英國）跟中國最早的接觸是間接的，英國都鐸王朝（Tudor House: 1485-1603）時，英國人逐漸接納歐洲最早漢學，即伊比利亞半島對中國研究的相關成果，如 Gonzalez de Mendoza 的《大中華帝國志或大中國史：西班牙奧斯定隱修會會士的一種中國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1585 年出版於羅馬）翻譯成英文；且英國人慢慢地接觸華僑，如 Francis Drake 爵士在位於馬來半島的西南岸的馬六甲群島，於 1579 年接觸一位中國的消息提供者。後來，伊麗莎白一世（Elisabeth I, 1533-1603）寄給中國皇帝一封拉丁文的信，不過這封信似乎從未到達中國，之後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也曾寫英文信到中國，今天還保存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7 世紀初，英國開始收藏中文的印刷資料，在今天牛津大學圖書館（the Bodleian）與不列顛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都還能看到。不列顛第一個含中文書的目錄出現於 1697 年，即所謂 Bodleian 收藏品。17 世紀的英國還是透過翻譯作品來認識中國，如西班牙籍耶穌會神父曾德照（P. Alvarez Semedo, 1586-1658）的《中國帝國》（*Imperio de la China*）及《偉大與著名的中國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ed Monarchy of*

China）是由義文翻譯成英文，另一本書為義大利籍耶穌會神父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韃靼人的戰爭》（*De Bello Tartarico*），倫敦出版品有《陳述滿族佔領中國的故事》（*Bellum Tartaricum*），兩本書都於 1655 年出版。在此要提出一個完全非漢學的漢語研究的英國研究成果，即 John Webb（1669 年）的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一篇歷史論文，企圖證明中國帝國的語言為原始的人類語言）。這本書基於基督宗教信仰而總括當時耶穌會傳教士們（尤其是法國的耶穌會會士）對中文向歐洲人所表達的資訊。

18 世紀歐洲開始認真地想多認識中國，不過英國好像不一樣，他們越來越不相信中國是一個特別的文化，而奇妙的是 18 世紀英國逐漸加強跟中國的貿易關係。在這種背景之下，只有少數人做了努力來較深度地了解中國。當時不列顛漢學方面的成就為 James Wilkinson 於 1719 年翻譯 Bishop Thomas Percy（1729-1811）所出版的中國 17 世紀的小說《好逑傳》（*Hao-Ch'iu Chuan*）英文書名為 *Pleasing History*。此文學著作可能為歐洲人自行翻譯的第一本中國文學作品。1731 年耶穌會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將元朝戲劇《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同時英文譯本當時也出現於英國。其實當時所有翻譯工作都是由耶穌會會士用法文所做的，英國皇家學院也都是透過法國而認識中國。¹

19 世紀初期不列顛外國的漢學工作基地在印度孟加拉與廣州。馬六甲地區對不列顛本地的漢學研究發

* 此篇報告是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推動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各系（六系）有關其相關語言中漢學研究的現況」之部分；作者為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副教授、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負責人。

1 英國皇家學院成立於 1622 年，全名為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展也有回饋，譬如在 1837 年 George Staunton 爵士以將 Robert Morrison 圖書館的圖書送到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作為一個誘因，²說服校方聘請一位中文教授，由 Reverend Samuel Kidd（1799-1843）出任第一位教授。並將 Thomas Manning（第一位英國人抵達西藏的拉薩城）的中文書籍當作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財產。³1829 年 G. Staunton 爵士也把他自己的中文書捐給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改善其中文書方面的政策，習慣把中文書包裹寄給英國，Fowler Hull of Singaur 亦把他的中文書捐給不列顛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如此一來，越來越多公開機構有中文的資料。

George Staunton 的貢獻是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設立倫敦第二個中文系，第一個教授為以前的口譯者 Fearon。雖然當時倫敦有兩個中文系，但研究品質不如創始於 1814 年的法國 Collège de France 的文言系及 1843 年創立的 L'Ecole Langues orientales 現代中文系。

倫敦大學在漢學制度化的開始影響到後續的發展，由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及英王愛德華時代大學所建立的漢學系及擴大中文書的藏書可以證明。此過程的主要動機來自於政府服務而不是傳教事業。不過第一位對不列顛大學中的漢學真正有貢獻的是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他對 David Collie 及其他部分中國經典翻譯提出一些批評及擬定重新翻譯四書五經的大計畫。他在此方面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1876 年成為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中文教授（英國第三個學系），也得到國際的聲望。在理雅各的朋友在經費方面的努力幫助之下，同年 Joseph Edkins（1823-1905）製作牛津大學 the Bodleian 的新目錄表。英國大學第四個漢學系於 1888 年建立於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如同倫敦 University College 一樣，於 1886 年由威妥瑪（Thomas Wade, 1818-1895）爵士捐贈 650 本中文書後所成立。他也成為此學系的第一位教授。他曾在中國做過口譯者和外交官的工作，他最

大的貢獻為制定中文的拉丁字母拼寫的方法，叫做威妥瑪式標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20 世紀初英國大學第五個漢學系，在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成立，第一位教授為 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此系只存在到第二世界大戰時期。雖然英國大學的五個系並不是所有時間都有漢學教授擔任，不過此為不列顛帝國主義高峰之表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漢學生也開始學習日文，如此也可用到日本漢學研究的寶庫。不列顛大學漢學系大部分的教授之前都有過其他經歷，而後才開始大學教書生涯，這好像是一個不列顛漢學的固定特徵之一。其實，一個戰後不列顛漢學的成就為 1954 年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所出版的第一本《中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到現在為止，他與其合作者已有 23 本著作問世。此計畫而後建立了「李約瑟研究院」（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不過此計畫也有國際合作的幅度，在倫敦大學亞非拉學院也創立一個亞洲技術史顧問機構。

1963 年利茲（Leeds）大學創立不列顛第六個中文學系，其專長為現代中國研究。1965 年愛丁堡大學（Edinburgh）也建立了一個中文系，不過在格拉斯哥（Glasgow）創立一個漢學系的計畫從未實現。此時段中國研究發展的高峰大概為牛津大學 1980 年 Queen Elizabeth House 所建立的現代中國中心（the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早已於 1966 年在劍橋大學進行「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計畫，也受到美國中國研究界的大力支持。

T. H. Barrett 在他的《興味索然的獨一性：中文書與不列顛學者之簡史》（*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按筆者所見，此書到現在為止，在有關不列顛漢學研究史方面，仍是最好的一本專著，他對不列顛漢學／中國研究史做出一些結論：

1. 不列顛漢學／中國研究一直太依靠外國人的慷慨襄助，雖然現代需要國際化，不過不能忽略本地優秀漢學家或中國研究者。

2 Robert Morrison 圖書館現為倫敦大學亞非拉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3 皇家亞洲學會創立於 1823 年，創始人是 Henry Thomas Colebrooke 及其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也有 George Staunton。

2. 不列顛圖書資源到現在為止還不能善用，中文圖書館彼此間應該有更好的合作。
3. 不列顛漢學／中國研究一向太強調功利價值，等於作生意或貿易的價值。
4. 最重要的任務為：基於對中國有知性興趣而培養優秀漢學家或中國專家的人才。

二、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概況

英格蘭高等教育資金參議會（HEFCE：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建立一個小組，⁴ 名叫「中國研究 HEFCE 檢討組」（a HEFCE Review Group on Chinese Studies），以細查英國高等教育中有關中國研究供應現況為主題。英國重要城市擔心高等教育機構無法處理當時不列顛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與外交方面的關係。該檢討的背景也考慮到所謂「大中華」（Greater China：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所以根據英國相關需求而在教學、研究及活動方面的中程計畫安排進一步發展空間。該報告的基本結論如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放政策及其經濟成長以及英國願意進一步與其合作，為不列顛當代貿易方面及其他關注與利益的挑戰與機會。
2. 如此，需要更多中國語言技能的培養及對中國文化及其政治與社會系統的直接經驗。
3. 回應此種需求，要提供格外與明確規劃的經費補助。
4. 要達成此目的，就要支援數目有限制的專門知識中心，所支持的範圍包括：語言技能、區域與文化研究及有關中國其他科學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5. 為了培養跨領域的技能，那些中心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為大學畢業者準備中國研究之外，但在該學科領域方面的中國教學課程。

除此之外，此檢討小組也給支援高等教育的資金機構與其他機構做了一些建議，譬如：1. 在中國研究持續供應上，應該強調已建立學科館藏之間的合作；2. 相關資金機構也應該添加額外的資源，兼用到課程安排及設立好的圖書館；3. 相關資金機構在五年內要特地檢

視中文學習補助狀況，假如必要時，再增加資源；4. 相關資金機構應該支持國內中國研究學術與其他專門知識的資料庫等。到今天為止，大概應該可以評估此報告對英國中國研究實際發展有如何的影響力。就該報告範圍而言，檢討不只要包括傳統的語言教學與區域研究的供應，而且也涵蓋所有有關中國的學術領域，包括社會科學在內。地理上的第一個焦點為大中華。此檢討總為改善與發展英國中國研究表達其需求層次為政治、商業與貿易及文化方面的需要。

（一）大學制度內教學與研究的漢學機構（按創立年代排列）

1.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

理雅各於 1876 年擔任牛津大學的第一位中文教授。首先，此學系先屬於「東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之後屬於「東方研究院」（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在理雅各的繼承人當中，有 H. H. Dubs、David Hawkes（1959-1971）及 Piet van der Loon（1972-1987）。1930 年代設立「Honours 中文學院」（the Honours School of Chinese），其課程重點在於文言文與早期中國哲學，為了擴展教學與研究的合作，1995 年建立「中國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1982 年建立的「中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以後與「現代中國中心」（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entre）合併作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

牛津大學對於現代中國研究以及中國研究機構合併的政策，由一個研討委員會重新評估。自 1995 年以來，牛津大學擴大與分散其對中國研究的模式。其中，最明確的措施為在社會科學領域設立學習與研究機構。自 20 世紀以來的中國，其經濟、社會、政治及國際關係等，都不斷在進步，對那些部分展開研究，是一種研究的新方向，其重點在展現「現代中國」。

2.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omas Wade 爵士於 1888 年擔任劍橋大學第一個中文教授，此事實證明，雖然劍橋大學對中國研究（漢

4 HEFCE Report 99/09, February 1999,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英格蘭高等教育資金參議會的〈〈英國〉中國研究綜覽〉，1999 年 2 月）（載 <http://www.hefce.ac.uk/pubs/hefce/1999/09.htm>）。

學)從來沒有採取積極的態度,不過自1888年就有漢學研究的單位看來,漢學是有其存在地位。Thomas Wade 爵士的繼承人 Herbert Allen Giles 有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他的《中英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與《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像在不列顛其他地方一樣,劍橋大學對於中國研究的重要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時聘任對中國文化不同領域的專家,從原來的構想——只有一位教授且無助理師資,發展到6至8位教師,端視經費的補助而定。自1951年聘鄭德坤以及1959年聘任 Chang Hsin-tsang,兩位是有名的考古學與文學家,自此劍橋大學東方研究擁有中國專家。

劍橋大學自1945年具有文學士 Honours Degree 課程,原為三年,現在改為四年的課程,其中,大學生必須在中國留學兩個學期。此外,還有哲學碩士及博士的課程。像其他大學機構一樣,劍橋大學也擴大跨領域的研究模式及支援區域研究。大學圖書館的中文書原來由 Th. Wade 的個人圖書所贈送的,尤其是透過 Gustav Haloun (1898-1951) 和 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 教授而建立傳統中國研究的基礎,持有的圖書包括 L. C. Hopkins 的甲骨文,拍攝在縮微膠捲上的敦煌資料和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Owen Lattimore (1900-1989) 的一部分圖書也歸屬東方學院的圖書館。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辦許多研討會、研習會及專題演講。大部分的內容牽涉到中國大陸的現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問題。劍橋大學東方學院特別受到「牛頓托拉斯」(the Newton Trust)、臺灣教育部、蔣經國基金會和 the Chuan Lyu Foundation of California 的支持以及贊助。

劍橋大學出版社(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藉著叢書系列出版支持其學者,如(1)劍橋大學東方出版品(*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riental Publications*);(2)劍橋中國歷史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3)文學與機構(*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4)劍橋中國歷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5)中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劍橋哲學辭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⁵經過五年的翻譯、審定和編目工作。在八十餘位哲學教授與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完成了該本篇幅浩大的辭書,也完成了一件有關臺灣哲學界,同時也是兩岸三地哲學界的創舉。該辭典中有很多有關中國哲學的資訊。

3. 倫敦大學亞非利學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倫敦有不列顛第一個中文學系,於1837年在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設立,其第一個教授為 Samuel Kidd 牧師,最後一個為 Samuel Beal 牧師;在1837至1889年中,有12次沒有人就職的紀錄,其中,另外一個教授職位設立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個在職者為 J. Fearon 教授,他的繼承人有很多,其中有 W. C. Hillier,他於1904年擔任第二個教授。1914年至1925年間,倫敦沒有一位中文教授。其實早在1916年倫敦就已經出現龐大的新學術中心——東方研究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8年改名為亞非利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該學院發展得很快,也基於 the Scarborough Report 設立一些新的講師職位,如中國哲學、法律、藝術與考古學等講師職位,讓其發揮專長,專攻佛教文學或現代文學。亞非利學院的圖書館是 Robert Morrison 圖書的繼承者,透過 Edwards 與 Walter Simon 多方面的努力,而設立了一種具有傳統漢學與現代中國研究方面的資料。此外,該圖書館還有不同傳教會與商人家庭的檔案資料。過去該學院的成功工作,包括收集現代中文課本與文法課本,此外他們還把內容製作成唱片。

該學院的好處之一為附近有「不列顛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及「印度辦公室圖書館」(the India Office Library),這些機構也有寶貴的學術資料。基於 the Hayter Report 的推動,亞非利學院在現代中國研究方面,有主要的發展方向,1968年設立「現代中國研究所」(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自1960年起出版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出版工作自1968年屬於該研究所。

5 《劍橋哲學辭典》英文版主編羅為伯特·奧迪(Robert Audi),中文版審訂召集人是林正宏,由王思迅主編,2002年由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1940年代學生只有閱讀傳統漢學或現代中國研究的選擇，不過以後該學院把雙重漢學方向合併在一起，提供更平衡的課程。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於外地的學生也可以在亞非利學院拿到學位，此是大不列顛中唯一的安排。自1917有《東方研究學院學報》(*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自1940年它改名為《亞非利研究學院學報》(*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該學院跟中國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及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有特別的合作關係。

目前亞非利學院的研究機構，如下：

(1) 「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of Chinese Studies)

1992年設立，以促進不列顛與歐洲對中國跨領域研究的協助與發展。此有關中國科技整合中心有約30位師資。

(2) 倫敦大學亞非利學院臺灣研究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me)

1999年以來主要推動臺灣的研究、教學及學術性的交流，其現代臺灣MA課程是英語世界唯一的課程安排(<http://www.soas.ac.uk/department>)，臺灣研究計畫也舉辦定期的研習會與研討會。

(3) 現代中國研究所(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中國研究中心透過現代中國研究所來展現它的研究成就。所以它的工作完全是出版工作，負責由牛津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研究叢書系列」(*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4) 東亞法律中心(Centre of East Asian Law)

此中心於1988年設立，主要推動大學中的法律研究者對東亞法律的研究。

(5) 中國和內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該學系為「語言與文化學院」(*th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的一部分，其目標為藉著教學與研究瞭解廣泛的中國文化及西藏文化的一些層面。其中，相關語言的能力培養是基本要求。中國文學、漢學及東亞文學開設碩士學位；中文與西藏文也有碩士和博士學位。

4. 達勒姆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

1952年，R. Dawson在H. N. Spalding博士的支持下

擔任該大學人科院中的第一個中國研究教師，之後擴展為一個教授職位及協助其工作的6位專任、12位兼任教師。自1960年代，該單位中國研究發展跟Gulbenkian藝術與考古學博物館(*the Gulbenkian Museum of Art Archaeology*)，之後改名為東方博物館(*Oriental Museum (II)*)有密切合作關係。1989年建立東亞研究學院，目的為把中國與日本研究的機構和執行整合起來。1996年設立「東亞考古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ast Asian Archaeology*)，它與該大學考古學院有密切合作。達勒姆東亞叢書系列(*The Durham East Asian Series*)是由the Curzon Press出版的，加上該學院自己出版達勒姆東方論文(*Durham East Asian Papers*)，其中也有1998年出版，由Michael Dillon主編之《中國文化與歷史辭典》(*China: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ictionary*)。

1999年設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目標為鞏固對中國社會、文化、經濟及商業既有的研究，它為該大學政治學院及繼承「達勒姆中國小組」(*the Durham China Group*)的活動，承辦許多研討會。本中心跟達勒姆大學商業學院(*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Business School*)和地理學院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5. 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

根據Hayter報告，1963年設立中國研究部，作為以後的東亞研究系，屬於人科學院。自開始以來，像全部現代不列顛漢學研究一樣，特地強調現代研究，與社會科學領域或經濟學、地理學與歷史學連結在一起。現在，東亞研究系除了中國研究部，還有蒙古與日本部，亞洲—太平洋及東南亞部，包括對印度尼西亞、泰國的研究。

在中國研究方面有「中國商業與發展中心」(*the Centre for Chinese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與利茲大學商業學院(*the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共同管理。除此之外，2004年9月30日設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目前研究重點在於中國經濟及其發展，國際商業關係等主題。

自1963年東亞研究系的圖書資料越來越豐富，一

部分來自皇家亞洲學院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另一些部是 Owen Lattimore 的書籍。該系出版「利茲東亞研究論文」(Leeds East Asian Research Papers) 系列即由 the Curzon Press 出版《中國諸世界》(Chinese Worlds) 叢書系列。跟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及中國科學研究院有良好友誼關係。

6. 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愛丁堡大學於 1965 年建立中文系，為文科學院的一部分，J. Chinnery 博士為第一位主任。1988 年該系改名為「東亞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0 年中文的教授為 Bonnies McDougall。

該系最傑出的著作為 A. W. E. Dolly 博士的《中國戲劇藝術史》(History of Chinese Drama)。該系的重點在於現代中國文學。除了中國文學之外，研究生也會選擇臺灣文學。該系與愛丁堡大學其他系有密切合作關係，如藝術系，經濟系、社會人類學系及歷史系。

現在該系變成亞洲研究學院 (the School of Asian Studies)，容納中文、日本和梵文研究範圍，也包括「蘇格蘭中國研究中心」(the Scottish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及愛丁堡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7. 威斯敏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大學的中國研究於 1992 年設立，為 Holborn 學院的語言學程，及由中心倫敦工藝專科學校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的 Honours 學士學位課程所發展出來。該系的教學重點在於當代中國大陸，包括現代中文及許多領域研究的課程，中文、英文都用。

1978 年 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為不列顛第一個學術機構，為其學生安排留學中國的機會，該系的研究方向也是當代的中國。

8. 雪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雪菲爾德大學東亞研究學院 (Th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的歷史可追溯到 1963 年建立的「日本研究中心」(Centre for Japanese Studies)，此學院正式設立於 1990 年。1993 年在雪菲爾德大學開始教中國課程；而 1996 年於該大學社會科學院建立「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因此，該大學東亞研究現

在已經包括日本、中國與韓國研究，有比較完整的發展。

中國研究中心的教學與研究方向為歷史與社會科學，1994 年在東亞研究學院也可以獲得博士學位，該學院與「東亞商業服務處」(East Asia Business Services) 有密切關係，並且與雪菲爾德大學管理學院 (Sheffield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合作，其中國研究中心與中國的南京大學有合作關係。

9. 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鑒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重要性，諾丁漢大學設立「當代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推動跨領域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其中，如中國城市、地方性發展等題目，它的學位課程包括不同領域學科與中國研究以及中文的合併。該研究院也協助諾丁漢大學另一個學術機構「中國政策研究所」(th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筆者發現有些不列顛大學如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也對傳統、現代與當今中國 (包括香港) 的專業感興趣，經濟學系、社會史系、政治系，以及藝術史系都發展對中國研究的計畫。另外，亞伯敦提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tay Dundee) 於 1999 年發揮對中國的實用知識，「中國商業學程」(ChinaBiz Programme)，提供該大學的畢業者從他們的專業而對中國商業發揮興趣。

(二) 其他機構 (選擇)

1. 李約瑟研究院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此研究院座落於劍橋西區，靠近劍橋大學圖書館 Robinson College 的地方，獨立於劍橋大學之外的一個漢學研究機構。此研究院擁有「東亞科學史圖書館」(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也歡迎世界各地對東亞科技及醫學有極大興趣的研究者。此學術機構是「中國科學與文明計畫」(the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 的起點。

李約瑟在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構思出「中國科學與文明計畫」。1946 年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幫助設立「國際科學史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s),此小組包括科學史社會功能的委員會。李約瑟在第二次 UNESCO 總會議(1947 年 11 月)上,當時他代表自然科學部門(the Natural Science Section)提出「人類科學與文化史」(Scientific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ankind)計畫。在 1948-1949 年,與 Lucien Febvre (UNESCO 法國代表)共同參加許多會議,爲了讓「人類科學與文化史」的計畫進一步發展。他倆呈現很多精神共同點,1949 年 12 月李約瑟第一次提出「中國科學與文明計畫」,雖然當時此計畫引起很大的爭辯與反對,但李約瑟與其合作者,到現在爲止已出版了 23 本研究成果。該計畫現今進度由「李約瑟研究所出版會(the Publications Board of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會長 Christopher Cullen 管理,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叢書系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eries*)是由劍橋大學出版社自 1954 年以來所出版的。

在東亞和中國科技史方面,李約瑟研究院以及其圖書館提供給學者無比的研究環境。圖書館擁有近 25,000 種圖書,其中有很多著名的選集(*collectanea*)以及 20,000 種選印本。

該研究院也是學者相遇之處,一學年之內,每週都有舉辦研究班的學術活動;有時候,也做爲一些研習會或國際研討會的場所。自 2003 年 10 月,研究所所長是專任的 Christopher Cullen 博士。該研究院爲登記立案的慈善團體,最高責任單位爲其董事會。從私人及機構方面來看,該研究院最近的募款活動辦得很成功,順利募得一筆經費,其中有香港東亞科學史的基金會,紐約東亞科學史社團(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Incorporation)及香港中國文明教育托拉斯(Chinese Civilisation Educational Trust)。該研究院前景看好,不只其圖書館的藏書可以擴展,而且獨立研究的計畫也正在進行。

該研究院 1996 年也開始出版新叢書系列「李約瑟研究所研究成果」(*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到現在爲止已有 9 本(第 9 本出版於 2007 年),都跟中國科學與學術思想史有關。

2. 不列顛中國研究協會(或英國漢學協會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不列顛中國研究協會(或英國漢學協會),是一個非政治組織,其成員超過 200 個人,他們都對「大中華」感興趣。他們大部分來自學術團體,不過其中也有不少人代表商業、政府以及大眾媒體界。該協會在跟其他區域的研究組織、基金會,及有關中國代表室與政府機關等聯絡和資訊方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其學校聯絡主官(School Liaison Officer)努力跟英國學校以及學院(大學教育以下的學校)聯絡,爲的是推動當地的中國研究。

「不列顛中文教學研究班」(The Britis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eminar)是它的小組。該協會也協助一些有關中國政府的計畫,如研究評鑑執行(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教學品質評鑑(the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和 HEFCE 中國研究檢討(the HEFCE China Studies Review),它也處理獎學金,讓學生在暑假時到臺灣學習中文,以及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同時也舉辦年度全體大會。

此外,英國漢學協會包括「中國研究生網路」(CPN: the China Postgraduate Network),提供研究生與中國研究相關的資料庫。中國研究生網路每年出版一次時事通訊,當做該協會的年度學報的一部分,希望跟歐洲其他地區的研究組織,或中國研究學術機構發展更好的合作關係,也包括歐洲中國研究協會(EAC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在內。

3. 不列顛中文教學研究班(BCLTS: The Britis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eminar)

它是不列顛一個教學及其他語言的教學機構,中文教師的組織,也是英文漢學協會的小組,它的目標在於提高中文教學品質,藉著教學經驗及教學資料的交換而加以提升。爲達到此目標,每年舉辦兩次相關的研究班。該研究班的活動是由「牛津中文教學中心」(the Oxford Centr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所舉辦,不列顛所有大學及其他教學機構的中文教師都可以當作其成員,有義務付一年度成員費 20 英鎊。該研究班的成員同時也是英國漢學協會的成員,也會收到相關通訊及學報。

（三）中國研究方面的期刊（選擇）

1. 皇家亞洲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此期刊由皇家亞洲學會於 1834 年出版。該刊物的特色不只在於其悠久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當作一個發表高學術品質的論文論壇。它的研究區域從印度次大陸、中東、中亞到遠東及東南亞；研究的範圍包括歷史、考古學、文學、語言、宗教與藝術。其中，中國文化的部分佔了所有語言的重要部分。該刊物另一個特色為每次出刊，幾乎一半的篇幅都是書評。

2. 亞非利學院學報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該學報屬於跨領域的學術研究，針對亞洲、非洲及中東所做的研究，堪稱世界上最好的期刊之一。它的研究範圍包括上述地區從古至今的語言、文化及文明研究。自學科領域來看，它包括人類學、考古學、藝術、歷史、科學及醫學史，還有語文學、文學、音樂學、哲學及宗教學，該學報發表論文、評論、學術報告及通知。此外，其出版者為代表亞非利學院一方的劍橋大學出版社。

3. 現代亞洲研究 (*Modern Asian Studies*)

該刊物推動對現代亞洲的瞭解，以及讓人認識亞洲豐富的精神遺產，地理範圍包括南亞、東南亞、中國與日本。就學科領域而言，它還提供未發表過的有關歷史、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經濟、社會人類學及相關區域文化的研究論文；刊物篇幅較大的部分，也是最專業化的部分為檔案與新實地考察工作的專題論文。此外，其擴大書評的部分，也對最近發表的相關論著做仔細和深度的分析。該刊物全體編輯資訊委員共有 19 位，學者幾乎都來自英國，另外也有 19 位學者為通訊會員。

4. 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該季刊的內容為當代中國（包括臺灣在內）所有研究層面，其跨領域的研究方法包括以下的學科領域，如人類學／社會學、文學與藝術、商業／經濟學、地理

學、歷史學、國際關係和情況、法律及政治。它提供給學術界有關當今中國可靠的研究成果。除了主要論文及研究報告之外，每一冊都有佔大部分篇幅的書評，以及季刊記事部，後者記錄中國內及影響中國的所有事件。它的出版者為亞非利學院的當代中國研究。它的編輯委員會（包括總編輯以及書評總編輯），有 61 位學者。

三、結語：當代不列顛（英國）漢學研究的特徵

在以上介紹不列顛（英國）教學與研究的漢學機構背景上，我們可以發現當代英國漢學的特徵。以下將相關特徵重新總括說明：

不列顛教學與研究的漢學機構是集中的，以倫敦大學亞非利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與李約瑟研究院為主，雖然從整個發展來看，其他機構也相當重要，不過其相關影響力不是那麼大。不列顛有一個非常強調功利與現實價值的漢學傳統／中國研究，過於強調現實政治與經濟價值，在所謂「古典」漢學學術研究方面可能大打折扣。

不列顛漢學傳統（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有一個集中的研究政策，其歷史發展可以用相關官方報告而寫作，如 1945 年「Scarborough 報告」，1961 年「Hayter 報告」或「1999 年 HEFCE 報告」。無論這些報告內容與政策在相關的研究機構落實到什麼程度，這種作風一定會全面影響到漢學發展及其氣氛。這方面與例如德國漢學不一樣。

從過去來看，不列顛漢學／中國研究一直依靠外國人來運作，更不用說在當代全球化時代中，更容易與中國人合作，不過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將那些具有真正學術興趣的本地人培育成為優秀的英國漢學／中國學家。

在英國高等教育與大學政策，越來越被視為市場產品，大學就是主要商品的供應者。此外，也有政府補助迅速縮減的現象，此種環境並不促使漢學或中國研究的發展，很可惜這也是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困難。